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研究丛书

明清京杭运河沿线 漕运仓储系统研究

郑民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研究丛书

明清京杭运河沿线 漕运仓储系统研究

郑民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京杭运河沿线漕运仓储系统研究 / 郑民德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6084 - 8

I . ①明… II . ①郑… III . ①大运河—漕运—仓储系统—研究—中国—
明清时代 IV . ①F55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903 号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21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得聊城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与
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金项目资助
(编号: 211051321)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缘由、目的与意义	(1)
二 学术史回顾	(3)
三 本书的史料运用	(11)
四 本书主要内容	(13)
五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4)
第一章 明清之前中国的漕运与漕仓	(16)
第一节 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与仓储	(16)
第二节 隋唐宋元时期的漕运与仓储	(21)
第三节 明清之前漕运的特点	(27)
一 漕运量不稳定	(27)
二 漕运制度不完善	(28)
三 漕运弊端尚不严重	(29)
第二章 明清京通仓的建置、沿革、粮数与修造	(30)
第一节 明清京仓的建置与沿革	(30)
一 明代京仓的建置沿革	(31)
二 清代京仓的建置沿革	(36)
第二节 明清通州仓的建置与沿革	(40)
一 明代的通州仓	(41)
二 清代的通州仓	(44)
第三节 明清京通仓粮数及变化	(46)
一 明代的漕运数与京通仓粮数	(47)

二 清代的京通仓粮数及其变化	(52)
第四节 明清时期京通仓的修造	(57)
一 明代京通仓的修造	(58)
二 清代京通仓的修造	(63)
第五节 小结	(66)
 第三章 明清时期京通仓的管理与运作	(70)
第一节 明清京通仓储的高层管理与机构设置	(70)
一 明代京通仓官员的设置及其历史演变	(71)
二 清代京通仓储管理机构的演变	(79)
第二节 明清京通仓储的基层管理者与劳役人员	(83)
一 明代京通仓的基层管理者与劳役人员	(84)
二 清代京通仓的基层管理者与劳役人员	(87)
第三节 明清京通仓储的日常运作	(92)
一 明代京通仓储的运作	(93)
二 清代京通仓储的运作	(97)
第四节 小结	(105)
 第四章 明清时期的运河水次仓	(108)
第一节 明代的运河水次仓	(109)
一 天津水次仓	(110)
二 德州水次仓	(113)
三 临清水次仓	(117)
四 徐州水次仓	(120)
五 淮安水次仓	(123)
六 明代的其他运河水次仓	(126)
第二节 清代运河水次仓	(129)
一 临清、德州二仓	(130)
二 徐州、淮安二仓	(136)
三 江宁、凤阳二仓	(138)
第三节 小结	(140)

第五章 明清时期京通仓与水次仓的功能及作用	(143)
第一节 京通仓与水次仓的政治功能	(144)
一 皇室宗藩人等对京通仓粮的消费	(145)
二 文武百官对京通仓粮的消耗	(156)
三 明清水次仓的政治功能	(162)
第二节 明清京通仓与水次仓的军事功能	(167)
一 明代京通仓与水次仓的军事作用	(168)
二 清代京通仓粮对京城驻军的供给	(174)
第三节 明清京通仓及水次仓的经济与社会保障功能	(177)
一 明代京通仓的社会保障功能	(177)
二 清代京通仓的赈济与保障作用	(181)
三 明清水次仓社会救济功能的发挥	(192)
第四节 小结	(198)
第六章 明清京通仓与水次仓之弊	(201)
第一节 明代京通仓与水次仓弊端	(201)
一 明代监仓宦官与朝臣的斗争	(202)
二 宦官祸乱仓储的具体体现	(206)
三 其他势力对京通仓的危害	(209)
第二节 清代京通仓弊端	(213)
一 清代京通仓花户对仓储的危害	(213)
二 清代地棍与仓匪对仓储的危害	(222)
三 其他势力对京通仓的破坏	(226)
第三节 小结	(231)
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京通仓与水次仓火灾	(233)
第一节 明清仓储火灾律法及演变	(233)
第二节 明代的京通仓与水次仓火灾	(236)
第三节 清代的京通仓火灾	(238)
一 清前期的京通仓火灾	(239)
二 清中期的京通仓火灾	(240)
三 清末的京通仓火灾	(244)

第四节 小结	(247)
第八章 明清基层社会的小型漕仓及闹漕、哄仓之争 (249)	
第一节 明清时期小型漕仓的分布	(251)
一 山东境内的小型漕仓	(251)
二 南直隶境内的小型漕仓	(254)
三 其他有漕省份的小型漕仓	(258)
第二节 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漕弊	(260)
一 明代基层社会的漕弊	(261)
二 清代基层社会的漕弊	(263)
三 明清漕弊之比较与漕运的变革	(267)
第三节 清代基层社会的闹漕与哄仓之争	(269)
一 清代运河区域的闹漕运动	(269)
二 长江流域有漕省份的闹漕斗争	(275)
结语	(280)
参考文献	(286)
后记	(295)

绪 论

一 选题缘由、目的与意义

中国漕运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远古人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① 的航运活动开始，便逐渐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漕运。进入奴隶制国家后，对积蓄的重视又加快了漕运事业的发展，早在 3000 多年前的商朝，中国的先人们就已经利用黄河及其支流漳水、衡水，将中原的粮食运输到河南曲周县的巨桥仓，这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漕运仓储。其后，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元，直到专制社会后期的明清，中国漕运与漕仓的建设始终在挫折中发展，这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漕运的依赖，同时也是中央政权利用漕运调剂余缺、平衡粮价、集中财富、满足京城供给的一种需求，是控制基层社会、巩固政权、强化统治基础的必备之举。正是因为漕运对几千来的中国社会影响如此之大，所以强化对漕仓的探讨，不但可以深化漕运史的研究，而且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的背景下，对于运河沿线城市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清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② 漕运作为维系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对京城供需、粮价平衡、灾荒赈济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漕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随着经验的积累与制度的完善，迄至明清，中国漕运与漕仓建设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明清漕仓共分为京通仓、水次仓、小型兑漕仓三类，其中京通仓是国家漕粮收储的终点，水次仓是漕粮中转的中介，小型兑漕仓是漕粮缴纳的起点，这些漕仓作为明清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① （清）李道平：《周易季解纂疏》，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 页。

② （清）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54 页。

漕官、漕河、漕制、漕粮、漕军、漕船、漕法共同组成了结构健全、组织严密、制度完善、运作有规的国家漕运系统。尽管目前学术界关于明清漕运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而且很多是不刊之论，但其关注点多集中于漕运的宏观研究，对漕运仓储，尤其是水次仓与地方小型漕仓着墨不多，因此有着进一步扩展与深化研究的必要。

明清京通仓、水次仓、小型漕仓的分类与划分有着严格的标准，这其中既与其所处的地域范围、经济发展状况、水道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还与其存储漕粮的数量、行政管理级别高低、功能强弱、国家漕运政策等因素密不可分，是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明清漕运仓储的兴衰就是明清专制社会兴衰的风向标，在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运道畅通的情况下，不但地方漕粮征纳顺利，官民关系相对和谐，而且京通仓与水次仓的建设、管理、作用发挥都呈现出较高的效率，而到了专制社会的末期，随着运河的淤塞与官场吏治的腐败，官民冲突也日益剧烈，闹漕、抗粮、京控等事件层出不穷，同时京通仓、水次仓的管理也逐渐陷入混乱，仓场大案要案频现，存粮数量锐减，对国家的作用不断削弱。特别是清末，在西方轮船、火车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漕运开始走向没落，漕仓也随之衰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明清漕运史的研究开始了一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掀起了一股运河与漕运文化研究的热潮。傅崇兰、李文治、江太新、彭云鹤、鲍彦邦、李治亭、许檀、黄仁宇、陈峰、吴琦、于德源、王云等专家与学者对明清运道变迁、漕运制度管理、运河城镇经济发展、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明清漕运史的深化与拓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不过总体来说，由于前期研究多注重政治史、制度史、城市史、社会史等方面，对漕仓虽有涉及，但不甚系统与深入，因此可以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与进步。

目前，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沿运河城市也不断增强运河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积极发展运河旅游业。而漕仓作为明清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影响了运河城市与城镇数百年的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受到现代社会的关注与重视，这不仅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同时也是更为全面的了解明清运河与漕运文化、古代交通与积蓄手段、传统社会物资调运的最直接途径。

二 学术史回顾

以往关于明清漕运仓储的研究以京通仓为主，这其中又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对其粮价平衡、灾荒赈济、弊端漏洞、基层夫役等方面论述不够全面，至于运河沿线的水次仓、地方州县的小型兑漕仓，更是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因此深入探讨三种仓储之间的关系，明确其脉络显得尤为必要。

（一）关于明清京通仓的研究

关于京通仓储较早研究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冯佐哲，他于1982年发表的《元明清时期的京通粮仓》一文，对元明清三朝的京通仓储制度沿革进行了简单的介绍。^① 1983年王永谦的《清代乾隆中、晚期的潞河漕运——〈潞河督运图卷〉的初步研究》虽主要说明了图卷中的漕运、船只、人物、商业情况，但对通州仓的地理位置、仓储分布及漕粮入仓前的相关规章也作了一定的探讨。^② 傅崇兰先生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一书，对运河与沿线城市经济、商业、人口、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通州仓的布局是与其优越的地理交通区位分不开的。^③ 曹国庆认为漕运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集权制度的产物，在清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清政府维持漕运的目的在于满足京城仓储的积蓄，其弊端也体现在仓场官员的贪污腐败与徇私枉法上。^④ 刘桂林以康熙朝通州仓弊为视角，讲述了雍正帝未登基前奉命查察通州仓案之事，他雷厉风行、办事严谨，仅用数天时间就查明了通州西、中、南三仓存粮数目、支放情况、霉变缘由，对违纪人员进行了严厉惩治。^⑤ 江太新、李文治两位先生在《论清代中叶漕政的败坏》一文中指出，清代中叶随着吏治的腐朽，漕运中的各种弊端也逐渐恶化，其主要体现在漕运官员的科索、仓储胥吏的压榨、地方州县的浮收、绅衿与地棍的包揽等诸方面，而这些负担统统被转嫁到普通漕户身上，从而加剧了官与民之间的对立，使清代漕政日渐走向衰败。^⑥

^① 冯佐哲：《元明清时期的京通粮仓》，载《史苑》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

^② 王永谦：《清代乾隆中、晚期的潞河漕运——〈潞河督运图卷〉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文物》1983年第1期。

^③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 曹国庆：《试论清代漕运的兴衰》，载《历史教学》1987年第7期。

^⑤ 刘桂林：《雍亲王通州查仓》，载《紫禁城》1990年第1期。

^⑥ 江太新、李文治：《论清代中叶漕政的败坏》，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关于明清漕运的研究逐渐兴盛，涌现了大量的学术成果。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文治、江太新先生所著《清代漕运》一书影响较大，该书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详细地论述了清代的漕粮、漕制、漕官、漕仓、漕军、漕河、漕运与商业发展，其中对漕粮入仓程序、京通廒数、存粮数目、仓廒管理考证尤详。^①彭云鹤的《明清漕运史》则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漕运制度最为健全的时期，漕运的发展不但满足了国家政治、军事的需要，而且推动了沿河城镇经济与商业的繁荣，但同时也给有漕省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②于德源对清代京通二仓的研究颇为深入，他不但详细考察了清代京通仓的规模、管理与收放制度，而且认为北京市场的粮食主要来源于从山东、河南贩运来的商品粮，京通二仓余粮并不占主导。^③康沛竹从灾荒史的角度出发，认为粮食储备关系国计民生，京通十五仓具有供应皇室官俸、保障军需、灾荒赈济的功能，对国家与社会意义重大，但是随着粮食采购制度的破坏、管理秩序的混乱、监督体制的有名无实，导致仓储各种作用大为削弱，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了一系列问题。^④陈日光介绍了明清时期通州码头的分布与功能，并对通州仓场的管理机构与历史演变进行了说明，对漕运风俗、仓储陋规、劳役人员也多有描述。^⑤

鲍彦邦的《明代漕运研究》一书，对漕粮、漕船、漕军均有具体的介绍，其中关于漕粮入仓也有所涉及。^⑥李治亭着眼于中国漕运的发展变迁，将水道整治、漕运管理、运河城市发展与漕运兴衰相联系，其中对明清漕运的研究最为深入，他认为仓场总督与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体制严密的漕运系统。^⑦尹钩科对北京历史上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明清时期京城灾荒赈济的各种措施，其中京仓在救济灾民、平衡粮价、稳定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⑧吴琦的《漕运与

①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② 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 于德源：《清代的京、通二仓》，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④ 康沛竹：《清代仓储制度的衰败与饥荒》，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⑤ 陈日光：《水陆要埠通州码头》，载《北京工商》1996年第12期；《古代的通州粮仓》，载《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2期。

⑥ 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 李治亭：《中国漕运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

⑧ 尹钩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社会制衡》一文，从漕运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保持统治平衡的角度出发，认为封建国家漕运是统治者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其主要措施即利用漕粮平粜粮价与赈济灾荒。^① 陈峰分析了明清京通仓储之间的异同，并对仓储管理人员之间的博弈与冲突多有描述，正是因为胥吏与监仓官员的相互勾结，才使京通仓管理日益混乱，弊窦百出，从而导致了国家漕运的衰败。^② 陈佐立的硕士论文《明代粮仓研究》，对明代仓储的类型、作用、兴衰作了探讨，其中对京通仓库的名称、数量、收支状况进行了统计，并以图表的形式予以表示。^③ 高寿仙充分利用《明实录》里面的相关资料，对明代京通二仓研究颇为深入，无论是仓储的设置背景、管理机制、仓粮收支、粮数变化、功能作用都有所涉及，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明代京通仓的实际状况。^④ 于德源致力于北京地域文化的研究，不但考察了北京古代的河流水系，而且以时间为序，将北京历代漕运的发展脉络作了清晰的介绍，其中元、明、清三代的京通仓场是其论述的重点。^⑤

梁科的硕士论文《明代京通仓储制度研究》，将明代的漕仓进行了分类，对仓储管理的各级人员与基层劳役人员也作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对漕粮额数、运粮卫所、仓粮保管、漕粮海运、仓储危机也多有涉及。^⑥ 倪玉平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将清代中期漕粮海运与广阔的社会背景相结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深刻地剖析了漕粮海运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辩证地考察了清代漕运兴衰的缘由。^⑦ 刘宗志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对清代京仓粮食的来源、用途、发放模式进行了介绍，并以实例说明了漕粮霉变是导致清代仓粮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⑧ 朱小平的《清代的漕运与仓场》，对清代漕运作了简单说明，其中关于漕运总督与仓场衙门的建制及职能介绍尤详。^⑨ 李群的

^① 吴琦：《漕运与社会制衡》，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② 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③ 陈佐立：《明代粮仓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④ 高寿仙：《明代京通二仓述论》，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⑤ 于德源：《北京的漕运与仓场》，同心出版社2004年版。

^⑥ 梁科：《明代京通仓储制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⑦ 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2005年版。

^⑧ 刘宗志：《清代北京的仓储》，载《中国减灾》2008年第5期。

^⑨ 朱小平：《清代的漕运与仓场》，载《海内与海外》2009年第3期。

《清代漕运法研究》一书，除对中国漕运的演变历史进行了介绍外，重点论述了漕运法的界定、清代漕运法的立法背景、漕运法的法律形式、清代漕运法的基本内容与实施考察等，其中对漕粮仓储机构及相关法规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① 钟行明从历史地理学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对明代京通仓的选址、建筑用材、维护修缮、管理运作都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他认为明代京通仓储的营造“有章可循”，其规划与设计都有着严格的制度与程序。^② 袁飞以清代嘉庆朝通州仓舞弊案为中心，探讨了嘉庆朝漕政腐败的实况，指出了其弊端的新特点，从而揭示了清朝由盛而衰的趋势。^③ 孙逊、李雄、唐鸣镝的论文《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利用模式研究——以北京南新仓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认为南新仓是北京九个古仓库中保护最好，规模最大的古仓遗迹，对研究粮仓文化与漕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际调查分析南新仓街区的保护与开发情况，可以提出“南新仓”保护利用模式，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④ 张艳丽以清代北京的自然灾荒救助制度入手，指出京通仓粮是京师平粜粮食的来源之一，是稳定社会秩序、应对灾荒、稳定粮价的重要手段。^⑤

综合来看，关于明清京通仓研究的专著较少，多是在漕运史、运河史、城市史、社会史的著作中有所涉及，即使数篇关于京通仓的专门性论文，也多以制度变革为主线，旁涉其弊端、运作、功能，对其经济与社会赈济意义较少论及，因此有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二）关于明清大型水次仓的探讨

明清大型水次仓是转运与存贮国家漕粮的中转站，主要分布于天津、德州、临清、徐州、淮安、江宁、凤阳等沿运城市，这些仓储多时存粮达数百万石，少时也有十数万石，不但起着填补京通仓粮缺额、公共工程用粮、运军与地方驻军供给的作用，而且对于沿运诸省的粮价平衡与灾荒赈济也意义重大，关于明清大型水次仓的研究在城市史、灾荒史、社会史著

^① 李群：《清代漕运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钟行明：《明代京通仓的营造》，载《建筑与文化》2010年第11期；《明代京通仓的管理运作》，载《中国名城》2011年第4期。

^③ 袁飞：《论嘉庆时期漕政的腐败——以通仓舞弊案为中心的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

^④ 孙逊、李雄、唐鸣镝：《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利用模式研究——以北京南新仓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⑤ 张艳丽：《清代京师平粜探析》，载《学理论》2014年第18期。

作中多有体现，但专业性的探讨尚需深入。

天津社会科学院林纯业考察了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正是由于大量漕粮在天津仓的存储与国家漕运政策的刺激，才使天津逐渐由单纯的军事卫城演变为漕运码头、商业基地、物流集散中心。^① 许檀在《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一文中指出，明永乐年间会通河畅通以后，运河成为南北商品交流的主要渠道，为当时国计民生之所系，由此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天津等城市逐渐兴起，其中临清因仓而建城，因漕运与仓储而促进了经济与商业的发展，进而演变为全国性的商贸城市。^② 毛佩琦同样以临清为视角，认为明代临清由偏僻小城发展为重要的商业都会是大运河交通作用的功劳，其漕运咽喉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临清水次仓不但每年转运、存储国家数百万石漕粮，而且起着调节粮食盈亏，稳定市场的功能。^③ 罗澍伟着眼于近代天津的城市化与商业化，但在叙述天津城市的区位环境与早期开发及天津城市地位的奠定、形成、确立中，仍然用较大的篇幅说明了元明清三朝漕运对天津的影响，其中天津漕仓即是促使城市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④

吴忠起对我国古代的漕运中转仓进行了梳理，概括了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其中对明清水次仓的名称、规制作了简单介绍。^⑤ 嵇建琴的《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一文，主要分析了宋元明清四朝的漕运思想与策略，对漕粮运法、漕运中商业原则的运用、河海之辩、漕赋改折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而中国漕运由支运到长运的转变，实质是漕运制度的不断调整与完善。^⑥ 陈桦、刘宗志对清代各种灾荒救济措施作了深入分析，其中对德州、淮安、临清等水次仓粮食的来源、本折比例、征解州县、管理机制都有述及。^⑦ 王云对明清山东运河文化研究颇深，其所著《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一书，不但涉及河道治理、漕运制度、仓储榷关、城镇发展、交通网络、商业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的方面，而且在介绍山东运

^①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载《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②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③ 毛佩琦：《明代临清钩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④ 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 吴忠起：《我国古代的粮食仓库》，载《中国储运》1996年第1期。

^⑥ 嵇建琴：《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⑦ 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河沿岸的德州、临清水次仓时将其与当地的自然、经济、文化环境相结合，真正做到了国家漕运与地域社会的统一。^① 韩嘉谷的《天津古史寻绎》，叙述了天津从远古到明清时期的发展历程，明代天津置卫的目的就是守护粮仓，城市的最初定位也为军事重镇与仓储基地^②。

贾珺的《建筑史》虽然从空间与地理学角度研究城市建筑，但在说明通州、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运河城市的选址缘由时，仍然重点介绍了漕运仓储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③ 杨义春的《南粮北运中专库，明清华天下大粮仓——从常盈仓到丰济仓》一文探讨了明清时期淮安仓与漕法演变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名称、规模、维护、功能予以考证。^④ 王春瑜、杜婉言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颇深，其中宦官监督京通仓与沿运水次仓，不但严重扰乱了仓储秩序，破坏了户部官员的仓储管理权，而且勒索军民、扰乱郡县、贪污受贿，对国家仓政的正常运转造成了重大威胁。^⑤ 尹钧科认为淮安因优越的交通位置而成为漕粮、食盐、商货的重要转输枢纽，大量漕粮在淮安仓的积聚，不但吸引了漕运、河道、仓储等行政官员的驻扎，而且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也提高了淮安在运河城市中的地位。^⑥ 高寿仙从漕盐转运与淮安城镇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入手，对淮安仓存贮盐、粮的变化解析尤详。^⑦ 李俊丽的博士论文《天津漕运研究（1368—1840）》对明清两代天津漕运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考察与探讨，在叙及明清时期的天津漕仓时，不但重点介绍了仓储的建设、规模、管理，而且对其维修经费来源、防卫守护、夫役工食均有涉及。^⑧ 张春红分析了明清时期临清水次仓的建置、沿革、管理、功能，正是漕运使临清成为华北重要的商贸中心与粮食市场。^⑨ 胡梦飞以明代的淮安常盈仓为研究视角，对仓储的设置与沿革、管理与运作、功能与作用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⑩

①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韩嘉谷：《天津古史寻绎》，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③ 贾珺：《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淮安市政协文史委、淮海晚报社：《淮安运河文化长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⑤ 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王春瑜精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⑥ 尹钧科：《从大运河漕运与北京的关系看淮安城的历史地位》，载《学海》2007年第2期。

⑦ 高寿仙：《漕盐转运与明代淮安城镇经济的发展》，载《学海》2007年第2期。

⑧ 李俊丽：《天津漕运研究（1368—1840）》，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⑨ 张春红：《明清临清运河水次仓探析》，载《现代交际》2010年第2期。

⑩ 胡梦飞：《明代淮安的常盈仓》，载《江苏地方志》2012年第6期。

总之，关于明清运河大型水次仓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其建置、运作、功能都有所阐述，但主要集中于制度史方面的探讨，而对其经济与社会功能涉及较少。

（三）对明清基层社会漕仓与闹漕运动的探讨

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小型漕仓，主要分布于运河与长江沿线的有漕州县，是普通百姓纳粮的场所，与基层社会的联系最为密切。因其分布范围广、管理松散、存粮数量少，所以一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其实地方社会的小型漕仓不但是周边民众从事纳粮、商品交易、文化传播的公共空间，而且明清中后期的闹漕与抗粮运动也多发生于这些区域，是基层社会漕运中各群体博弈与冲突的场所，客观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

关于全面论述沿运各省基层社会小型漕仓的专著与论文尚未出现，只是在某些学术成果中有所涉及。薛理勇的《上海掌故辞典》介绍了上海一些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址，其中对明清时期上海漕仓的位置、名称、兴衰都作了考证，深刻地凸显了漕运对上海文化的影响。^① 李伯平在搜集山东高唐名人事迹的基础上，编成《高唐名人传略》一书，其中清康熙年间高唐知州谈鎔为便于民众就近纳粮，曾修复废弃的魏家湾水次仓，并立义学、救贫困、修德政，受到了广大百姓的拥戴。^② 张程娟以明代的山东张秋镇水次仓为案例，认为明宣德年间兑运法的实行与水次仓在运河沿线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水次仓也对沿运城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③ 袁飞、任博的《清代漕运河道考述》一文，虽主要考察了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的漕运水道，分析了各省水道与京杭大运河之间的关系，但对杭州、嘉兴、湖州、镇江、江宁、淮安等府所辖州县漕仓也多有涉及。^④

关于清代基层社会的闹漕斗争，目前学界相关研究较为深入，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张小也关注于清道光年间湖北崇阳的钟九闹漕事件，她认为正是因为在闹漕过程中充斥着漕户、胥吏、绅衿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与冲

^① 薛理勇：《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李伯平：《高唐名人传略》，齐鲁书社2002年版。

^③ 张程娟：《明代运河沿线的水次仓与城镇的发展——以山东张秋镇为例》，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④ 袁飞、任博：《清代漕运河道考述》，载《中国农史》2014年第2期。